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读张定浩《既见君子》

朱丽芳



《既见君子》
张定浩 著
华东师范大学
2014年1月出版

夏日的午后。安静的校园。教室里的那盆兰草因为乏人照顾，细长纤瘦的叶片枯黄不堪，一番整理，去芜存菁，加上水的润泽，又渐渐萌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虽然瘦长，总算是活过来了。

值班。除了偶尔拿取材料的新生家长，整个校园静寂无语，连喧闹的鸣蝉也悄无声息，这样悠闲的时光，正适合潜心读书。

慢读张定浩和他的《既见君子》。是真的慢，那些过去时代的诗与人，藏在发黄的典籍里，在岁月的长河里若隐若现，少了功底，便看不真切。张定浩的文字，有陆机所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之感，旁征博引、

大开大阖之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明白如话的文字，若不追溯源头，实难令人透彻领悟。于是一边查阅一边读书，停停写写，边悟边思，一个下午的时光，倏忽而过，却原来，还在文字里未曾脱身。只恨时间太快，而读书太慢，探究之心便愈加迫切。

与朋友聊，修身太难，对于中国传统经典，即便是我们，也实在知之甚少。就像一个人爬山，站在山脚，能看到的只有眼前一角的山峰，唯有向上走，才知道自己的视野是如何的狭窄。这本书，让人心生惭愧之余，又激励着你，想要读得更多，懂得更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正是好书的魅力所在。

作者在书中点评的诗人其实不多，六人而已。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大约作者偏爱魏晋风骨，从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到魏武帝与谢宣城，大都是汉魏两晋人士，包括其后的南北朝，只有李太白，那是中国文学史上说到诗人必然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说到这些旧时光里的诗人，书中并不刻意介绍生平或是作品，只是信笔由缰，一任思绪如流，从《诗经》《楚辞》缓缓而下。

说到曹子建，那是《魏风》中的“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本乎性情蹉跎半生的曹植，看到饱满鲜活的桃子，想到的却有“心之忧矣，其谁知之”的淡淡忧伤；说到陶渊明，一首《停云》，恰是对《郑风·风雨》的遥而望之，爱写四言的元亮（陶渊明字），是从《诗经》中踽踽而行的君子，走到六朝，不知不觉就停了脚步；说到李白，那是“明明如月”与“灼灼其华”的风情，春日迟迟中从桥的彼端流转而来；而谢朓的“澄江静如练”，是把整颗心置入《楚辞》和《十九首》的自然洗练之中，任由百炼钢化作绕指柔……

读这本小书，你仿佛跟着作者一起，穿行于遥远的诗歌丛林，在风雅颂的乐声中驻足，于诗词赋的韵脚中垂首，回眸间，往事千载，白云悠悠，空谷无声，又余音袅袅。诗人之后，出现的是那些在竹筒里沉寂千年的诗歌，比如《古诗十九首》《诗经》《离骚》。除了《离骚》，《诗经》《十九首》一度是心头所爱，所以读起来并不算陌生。但是，读到作者的文字，依然会被深深打动。与叙述与解读不同，作者更多的是将自己读诗的体会与生命的宽阔与细密、天地的浩瀚与高远相联系，叙说文字，叙说文学，更叙说当下。尤其是文字里的味道，明明是深藏的悲哀，却偏偏被清透的语言从容述说，令人掩卷沉思，叹息莫名。

“做笺注也好，写文章也好，首先都是自己读书的受用，所以能写出来或者能引用的，其实也都是自己的领会，领会到哪个地步，这笺注和文章也就能到哪个地步，是一点都掺不了假的。”作者如是说。想起那首《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河湾头淇水流过，看绿竹多么婀娜。美君子文采风流，似象牙仔细切磋，似美玉经过琢磨。文采风流的不仅是那些过去时代的诗与人，还有如今的他们，将经典细细说与我们听。有匪君子，如圭如璧。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我写大型现代黄梅戏《骄杨》（《忠魂曲》）

李光南

小时候，父亲常对我说，这世上最苦的差事是撑船、打铁、磨豆腐。如果父亲健在，我会对他说，还得加一个——编剧。这一行我干了20多年，大小戏写了100多部，也拿了“华表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唯一的收获就是两鬓雪霜、一身劳累。但我并不后悔，虽然我没有古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却也耐得住寂寞和痛苦。这是因为，我的写作是我心灵走向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在我的语境里，我觉得一切都复活了，一草一木都有了灵性。我常常为了某个人物和某个事件而纠结于心或者是深深感动，虽然过了许久，仍难以淡忘，甚至是愈久弥坚、愈久弥新，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七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的参演剧目、由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排演的大型现代黄梅戏《骄杨》（又名《忠魂曲》）。

我写杨开慧是从喜爱评弹《蝶恋花》始。2013年，苏州评弹学校副校长、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盛小云先生赠我一张她个人作品的专辑，里面就有她演唱的苏州评弹《蝶恋花》，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当即就想写一部“杨开慧”的戏。也凑巧，一次在合肥出差，省剧协的负责人找到我，说是某个演员想拿“梅花奖”，嘱我写个小戏。我当即就说出了我的想法，得到省剧协负责同志的认可，但他担心，“杨开慧”题材这么大，一个小戏能否盛得下？我说有办法，再大的题材也可以有小的“切入点”。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看过一本书，详细记载“杨开慧”从入狱到牺牲的全过程。我这个小戏的构思就是写“杨开慧”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情感世界”，即便是面对敌人的造谣、污蔑、中伤、哄劝，她依然“初心不改”，对毛泽东的坚贞不渝，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不变，对子女亲人的深深眷恋。想不到，这个戏居然“双喜临门”，既获得了安徽省小戏调演的剧目和编剧一等奖，又获得了首届“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更激发了我把这个题材再做下去的决心。在创作小戏时，我又接触和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但因小戏篇幅所限，难以把创作思想尽情表达，我萌生了创作大戏的冲动。2014年的夏天特别热，我把自已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漆黑的夜晚，我想象着杨开慧受重刑醒来看到高高的小小的狱窗透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忽然想起的契科夫的话：阳光，我爱你！我被深深感动了，泪飞顿作倾盆雨，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可以说，我是在汗与泪的交织中，终于把小戏拓展成一台六幕大戏。

《骄杨》（《忠魂曲》）是一部歌颂革命历史人物杨开慧烈士的黄梅戏。目前，国内把杨开慧形象搬上舞台

的，据我所知，有扬剧、豫剧、越剧，最早的是京剧，李维康演的《蝶恋花》。黄梅戏作为国内五大剧种之一，还没有原创剧目。这让我十分纳闷，黄梅戏质朴柔美，悦耳动人，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就是具有典型的“阴柔之美”，最善于表现现代题材，尤其最善于表现女性题材，却在杨开慧这一题材上“缺席”？不过话说回来，杨开慧不好写。第一，杨开慧的为人和为事家喻户晓，写真人真事历来是艺术创作的难题，如何从生活真实提升到艺术真实，是件头疼的事情；第二，写杨开慧的作品太多，如果不出新，重走老路，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写杨开慧，既是对剧作家的挑战，也是对黄梅戏的挑战。但是，看了一些反映杨开慧事迹的作品后，我非常有创作的欲望。这是因为，以往的一些作品，在“杨开慧”形象的塑造上，总把她塑造成毛泽东的战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无非是另一个“江姐”。而实际上，杨开慧既是革命者，又首先是毛泽东的夫人。她和毛泽东之间的情感经历既精彩又丰富，既曲折又动人，而这恰是被其它作品所忽视。

为了写好这台戏，我仍然借用了小戏的思路，从杨开慧生命的最后时刻切入进去，采用回闪和回忆的手法，通过敌人和叛变的战友的诱导和劝降，在情感的漩涡中塑造杨开慧贤惠、豁达、宽厚、包容的人物形象，表现杨开慧不同凡响的精神定力和执着情感。这部戏里的杨开慧，首先是“毛泽东的爱人”，是革命者的家属，其次，才是“革命者”。而“她”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一个“爱”字，因为她爱着“毛泽东”，所以她才对“毛泽东”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倾心，那么执着。她是因为爱着毛泽东这个人，才爱上他的事业和追求的，最终这种爱，因为对象的身份不同，而成为一种象征，超越了个人的范围，升华为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因此这种人性的力量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和感人，也才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

戏曲总是遗憾的艺术。因为各方面原因，创作的结果和动机总有些距离。但我深信，我创作的《骄杨》（《忠魂曲》）每一次播放都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只要我们能够正确把握创作导向，主旋律的作品同样拥有一大批观众，同样能久演不衰。

